

抗戰期間國共關係之研究

Study of KMT-CCP Relationship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劉順銘 上校 (Shun-Ming, Liu)

國防大學共教中心教官

莊國平 中校 (Kuo-Ping, Chuang)

國防大學共教中心教官

提 要

今(2011)年9月3日是我國對日八年「抗戰勝利66周年」的紀念日，去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參觀抗戰爆發地點蘆溝橋時談話，一反「抗戰勝利60周年」肯定國軍在「正面戰場」貢獻的基調，把所有功勞歸於中國共產黨，並誣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共產黨是民族救亡圖存，實現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其〈人民日報〉社論更指出，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抗擊外敵的第一聲號角。

鑑於中共扭曲史實，本文抱持「捍衛歷史」的嚴肅心情，引用學術史實資料，試圖還原中共如何利用抗戰，從不足三萬人槍的叛亂團體變為百萬大軍？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究竟為何？雙方各有何立場與作為？並據此提供省思與應有認知。本文認為，在抗戰的過程中，共軍扮演著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其所強調的「敵後戰場」部分，其在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努力，我們給予肯定。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取代「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的歷史定論。因此，我國人應了解歷史、忠於歷史，進而傳承歷史，一起緬懷及捍衛先賢、先烈的抗日史實，讓這些光榮事蹟永傳後世。

關鍵詞：八年抗戰、國共關係、國軍、解放軍

Abstract

The September 3, 2011 is the 66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Last year's anniversary, Hu Jintao, the leader of the mainland China, made a speech while visiting the Marco Polo Bridge where the war broke out. In the speech, he changed the tone used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and denied the contribution which the KMT Army had made during the war. Then, he put all the credit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aying that the CCP was the core power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liberation at then. Moreover, the People's Daily also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CCP which stood out first and launched counterstrike to the intruders.

The thesis was written to unveil the history distorted by CCP. Based on it,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below need to be discussed. First of all, how the CCP grew into a millions of regular

army from a small rebel group? Secondly, how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Further, what had they done to uphold their political ideas during the war? Through studying the issues above, The thesis is trying to provide reflection and awarenes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 and PRC. This thesis affirms that the Communist forces did have certain contribution in its efforts to fight behind enemy lines, to mobilize the masses, and to carry out guerrilla warfare. Even so, it cannot be replaced that the contributions which the KMT army made in the main battlefield during the war. Therefore, our peopl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and defend it to honor and remember those martyrs who had fought for our nation with their heroic and glorious deeds.

Keywords: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KMT-CPC relations,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NR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壹、前言

今(2011)年9月3日是我國對日八年「抗戰勝利66周年」的紀念日，中華民國國軍在對日抗戰期間，不畏犧牲，奮勇抗敵的英勇精神，以血汗贏得最後勝利，確保國家及百姓永續生存發展的契機。回顧民國26年中華民國財政窘困、武器裝備落後，憑藉著全民的抗戰意志，艱苦奮戰8年1月另7天，歷經22次大會戰，近4萬次大小戰鬥，官兵死傷321萬1,418人，¹終於贏得最後勝利。這場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續絕關鍵的一戰，讓中華民族民心得以凝聚。

然而令人遺憾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去年在參觀抗戰爆發地點蘆溝橋時談話，一反「抗戰勝利60周年」肯定國軍在「正面

戰場」貢獻的基調，把所有功勞歸於中國共產黨，並誣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共產黨是民族救亡圖存，實現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²其《人民日報》社論更指出，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抗擊外敵的第一聲號角。³鑑於中共如此扭曲史實，馬總統予以嚴正駁斥，總統強調對日八年抗戰，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獲得最後勝利，當時由國民黨執政，這是歷史事實，也是唯一的歷史真相，中共所稱「中共領導全民抗戰」，與史實不符。⁴

美國學者費正清曾著書指出，抗戰提供中共一個名正言順動員群眾的理由，更甚而替中共鋤開了動員的土地，⁵使中共隨著抗戰深入中國廣大領土，讓中共有機會與農民眾接觸，宣揚理念，紮根於廣大群眾，增添與政府對抗的實力，⁶究竟中共如何利用抗

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2年7月），頁403。

2 《聯合報》，99年9月6日，版3。

3 《人民日報》，2010年9月3日，版1。

4 《青年日報》，99年9月5日，版1。

5 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8年3月第9刷），頁363-365。

6 毛澤東在1964年7月10日接見佐佐木更三與黑田壽男所率領日本社會團體時，向佐佐木表示：「佐佐木不必為抗戰期間日本在華的紀錄致歉，事實上，他明白日本的行為，曾給『我們（指中共）』帶來極大的利益，

戰，從不足三萬人槍的叛亂團體變為百萬大軍。而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究竟為何？雙方各有何立場與作為？西諺有云：「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尊重歷史，不只是避免錯誤的良藥，更是延續部隊生命的基礎。今天，我們緬懷紀念抗戰勝利之際，持「捍衛歷史」的嚴肅心情，駁斥中共不實報導，將國軍對日抗戰精神與史實，一代代傳承下去。

貳、抗戰前之國共關係

抗戰期間該從那個時點開始，歷史學者看法不一。就英國記者勃脫蘭所言：「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砲，是在1931年9月18日晚間瀋陽發射的；中國開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砲，不是在東北三省或在上海或華北前線發出的，而是在陝西華清宮那邊發射出來的。」⁷所以，本文認為研究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無法簡單的從民國26年（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到民國34年（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八年來劃分。

國共鬥爭由來已久，抗戰前國民黨為執政黨，共產黨為遭政府圍剿的叛亂團體。

當時政府告訴國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⁸至民國26年初，當時軍事委員長先總統 蔣公仍認為「倭患急而易防」，⁹對於抗戰準備，從整理軍政，延攬人才，尚需三至五年方可完成，¹⁰故對日軍的挑釁一再容忍，積極建設以蓄積國力。但因日本的侵略步伐加快，國人抗日主張日熾，讓中共藉民意的抗日決心取得喘息機會。當時國民政府軍隊已將紅軍圍困於保安一帶，紅軍隨時有被消滅之勢，中共乃主動表達願與政府談判，¹¹並從民國25年2月開始改變「抗日反蔣」口號，將「抗日」和「反蔣」分開，¹²營造國共合作氣氛。政府為統一全國意志，乃對中共「撫剿兼施」，因而在5月5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後，¹³張沖即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

也大大的幫助了中國共產黨。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是奪取不了政權的。」中央日報海外航空版，民國74年5月18日，版一，轉引自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75年9月初版），頁205、248。

7 楊德鈞，《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臺北：北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8年3月），頁61。

8 蔣公於民國24年11月19日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中〈對外關係之報告〉講話資料，收錄於《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3，頁524。

9 蔣委員長民國26年9月30日日記所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94。

10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63。

11 周恩來於民國24年（1935年）9月致函國民黨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表達希望政府停止軍事行動，並說中共已準備隨時與國民黨談判。書函全文請參閱陳立夫，《成敗之鑑》（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6月），頁193-194。

12 〈抗日反蔣不能並提（1936年9月8日）〉，《毛澤東文選第一卷》，<http://www.ccy1.org.cn/theory/mxweb/html/mx01438.htm#tail>

13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文選第一卷》，<http://www.ccy1.org.cn/theory/mxweb/html/mx01385.htm>

在上海密會，¹⁴展開國共的接觸。8月25日中共致電國民黨，表示願意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擁護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¹⁵並草擬〈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¹⁶與國民黨談判。西安事變前，但當談判未果之際，西安事變忽起，隨後蘆溝橋事變肇生，從而促使國共的諒解與合作快速完成。有關抗戰前國共關係本文從歷史的兩大因素「西安事變」、「日軍加速進逼」分析如后。

一、西安事變

民國25年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1901-2001)與陝西綏靖主任兼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1893-1949)，劫持蔣委員

長(1887-1975)於西安，要求停止內戰，改組政府，一致抗日。此即影響中國現代史最為深遠的「西安事變」。九一八事件後，中共即頻頻號召全國民眾北上抗日，及至民國24年(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或稱八一宣言)，表示放棄推翻國民政府口號，並提出抗日救國十大方針；¹⁷另由毛澤東(1893-1976)與朱德(1886-1976)發表「抗日救國宣言」，說明中共願與任何「抗日反蔣」的政治派別、武裝部隊訂立「抗日反蔣」作戰協定，更願意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並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¹⁸以示中共抗日救國之決心。政府為求抗戰準備更周全，故對日軍的挑釁一再

14 當時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一、遵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請參閱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5年12月)，頁69。

15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文選第一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1424.htm>

16 草案內容為：政府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共產黨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等事項。詳請參閱《毛澤東文選第一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1936年10月)〉，<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1446.htm>

17 中共所謂抗日救國十大方針為：(一)抗日救國收復失地；(二)救災治水安定民生；(三)沒收日帝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四)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五)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八)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十)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日本國內勞苦民眾、高麗、臺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請參閱人民網，《共產黨新聞》，〈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1/2561513.html>

18 中共所謂十大綱領為：(一)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作抗日經費；(二)沒收一切賣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三)救災治水安定民生；(四)廢除一切苛捐雜稅，發展工商業；(五)發薪發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六)發展教育，救濟失學的學生；(七)實現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八)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的知識分子；(九)聯合朝鮮、臺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十)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請參閱人民網，《共產黨新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1月28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1/2561498.html>

忍讓，造成國內各界人士普遍誤認為中共是抗戰的真正推動者，對政府的「剿匪」政策形成極大的壓力。

是時中共為實現「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乃積極攏絡東北軍並了解張學良與楊虎城¹⁹的「剿匪」態度，民國25年1月將被俘團長高福源釋放返回東北軍進行抗日宣傳，²⁰同時毛澤東、彭德懷等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東北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是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建議互派代表協商聯合抗日，還提出組織國防政府

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²¹從而促成張學良與中共的三次會談，²²尤以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陝北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聯蔣抗日等問題所舉行的會談，雙方達成聯合抗日協議及停戰協定，²³張學良也同意中共在西安設置辦事處，使中共「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的願景浮現。5月5日中共號召「停戰議和、一致抗日」，要政府發揮「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立即停戰議和一致抗日，²⁴不要為了「集中統一」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忘記日本才是中國的最大敵人，²⁵同時中共也自承以往「把日帝與蔣

19 楊虎城乃國民黨西北地區實力派人物，中共從24年（1935年）11月即與楊虎城進行秘密聯絡，並對楊虎城與第17路軍施予大量的思想滲透。楊虎城自認為第17路軍並非中央嫡系部隊，有受排擠和壓制之威脅，中共即對第17路軍散播謠言稱：「蔣介石逼迫楊虎城圍剿紅軍，乃妄圖使紅軍與西北軍兩敗俱傷，讓蔣介石得利。楊虎城乃接受中共之主張，並與中共達成三項口頭協議即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雙方軍事行動事先通報，如有糾紛，雙方磋商解決。楊同意加入中共行動，從而促成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年9月），頁75-76；人民網，「東北軍走上抗日戰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619/6629/20011012/580167.html>

20 關於高福源被釋後對學良的影響，持反對意見的有姚立夫，姚表示高福源返部後即遭張學良槍決，詳請參閱姚立夫等編著，《西安事變珍史》（臺北：躍昇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8年11月再版），頁58。

21 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臺北：三民書局，民國78年3月增訂四版），頁713；另有關中共的說法請參見馬建離，〈東北軍走上抗日戰場〉，《毛澤東與國共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年9月），頁74；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619/6629/20011012/580167.html>

22 雖然姚立夫認為張學良不可能與紅軍勾結，但從兩岸間學者的著作中均可比對出相同的資料，張學良也自承曾於民國25年2～5月分別與共產黨中共中央連絡局局長李克農在上海及洛川會談兩次，4月在膚施（延安）與周恩來舉行第三次會談，詳請參見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頁713-714；另有關中共的說法請參見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係》，頁74-76；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印行，民國74年9月初版），頁476。

23 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頁713；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476；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係》，頁75；〈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36年〉，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5/2527426.html>；〈張學良(1901-2001)〉，中華人網，<http://www.greatchinese.com/famous/xianchen/zhangxueliang.htm>

24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245.html>

25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1936年8月25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216.html>

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²⁶讓張學良認為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和「逼蔣抗日」是真的，讓他有更充分的理由與決心爭取蔣委員長放棄剿匪，全面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後，政府即有討伐、主和及是否與張、楊談判之爭議，²⁷戰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認為西安事變把南京置於

西安的敵對地位，可能造成大規模的內戰，乃改變原先公審蔣委員長之主張，更之為有條件的釋放，²⁸指示周恩來代表中共，²⁹先與張、楊溝通，並於23日與蔣宋美齡、宋子文及張學良、楊虎城就〈八項救國主張〉及中共〈六項主張〉³⁰進行三方談判，³¹迫使蔣委員長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六項承諾，³²25日由張學良陪同返京，至此西安

26 〈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1936年9月1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207.html>

27 當時政府經中央常務會議及政治會議決議：一、張學良褫職嚴辦；二、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三、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四、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五、軍隊指揮調動歸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會議中意見不一，戴傳賢力主不可示張楊以弱，孔祥熙、宋子文主先予疏導），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6年12月12日〉，<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28 有關共產黨對處理蔣介石態度之轉變，在中共黨史資料及公開的資料中均未明確提及，以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的關係而言，中共對於蔣氏遭幽禁一事應是會以較積極之態度面對，但最後卻以主張和平處理收場，是否遭到蘇聯的壓力，共產黨亦未明說，箇中道理的確耐人尋味，但根據當時駐蘇聯大使所拍發回國之電報云：「李維諾夫：唯一協助方法，在使中國共產黨知道蘇聯政府態度」觀之，共產黨態度之轉變應是受蘇聯態度之影響。請參閱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收錄於姚立夫等編著，《西安事變珍史》，頁123-127。

29 共產黨於周恩來等一行抵達西安後，即拍發電報指示周恩來要以共產黨代表之資格與宋子文等談判，要旨為：（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力，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三）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贊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請參閱人民網，《共產黨新聞》，〈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致周恩來（1936年12月21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165.html>

30 周恩來所提出的六項主張為（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請參閱郝建生，《西安事變後的張學良》（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頁4-5及人民網，《周恩來選集》，〈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與宋子文談判情況（1936年12月23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7619/7646/2540680.html>

31 當時政府主張不可與張、楊談判，因此宋子文乃以私人身分前往西安參與談判，另有關三方會談及周恩來與蔣委員長間的對話，在《西安半月記》中並未提及，但在宋美齡所著之《西安事變回憶錄》及其他相關人的回憶錄或傳記中均有所記載，而且周與蔣在會談後，曾以三封電報向共產黨報備會談內容及蔣之承諾等，應可確定在至蔣介石的平安獲釋，共產黨是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32 六項承諾為：（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各項，如命令中央軍入陝部隊撤出潼關，西北各省軍政由張、楊負責等。此六項承諾蔣介石並未簽字，僅口頭承諾，請參閱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頁723。

事變和平落幕。

西安事變是國共合作的關鍵因素，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使十年的內戰停止，「全國統一陣線」在短時期內完成；³³也使中共從「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方向轉變，³⁴不僅改變了中共一向自詡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態度，甚至說「國事如今日，捨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³⁵西安事變對當時的局勢影響如后：

(一)政府停止「剿匪」：民國26年（1937年）1月6日裁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讓中共

獲得喘息和整補的機會。

(二)中共勢力擴大：侷限於保安、安塞、神木及府谷等4縣之地的紅軍，應張學良之派兵要求，順勢接管東北軍防地，使中共由4縣之地擴張為15縣，從而展開延安時代。³⁶

(三)紅軍變國軍：紅軍收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³⁷

(四)國共取得重新合作的前提：³⁸中共提出停止推翻政府的停戰議和通電，³⁹國民黨回應通過「根絕赤禍案」，⁴⁰蔣委員長亦表達願意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予以自新之路，⁴¹讓中共取得活動的機會。

33 這是英國記者勃脫蘭對西安事變的描述，詳請參閱楊德鈞，《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頁61。

34 有關中共從「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在中共內部各方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與周恩來和張學良的膚施（延安）會談有關，請參閱郭冠英，《張學良側寫》，頁243-245。馬建離，《毛澤東與國共關係》，頁75-76。

35 蔣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http://www.mfbmclct.edu.hk/reading/%A6%E8%A6w%A8%C6%C5%DC%A6^%BE%D0%BF%FD.htm>

36 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1974年3月），頁217-218。

37 蔣委員長表示：「只要中共願意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作赤化宣傳工作，其他皆可商量。」故中共「共赴國難宣言」送達國民黨後，即將紅軍編為第八路軍。請參閱蔣總統事長編一民國26年2月8日記載，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83年1月），頁164。

38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10月），頁334。

39 共產黨所提的「五項要求，四項保證」為：要求國民黨實行：（甲）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乙）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丙）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丁）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戊）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夠保證實行上列各條，共產黨願意向國民黨及全國保證實行下列各條：（甲）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方針；（乙）蘇維埃政府改各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丙）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丁）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請參閱人民網，〈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 1937年2月15日〉，《共產黨新聞》，<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139.html>

40 所謂「根絕赤禍案」之要點為：（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75。

41 郭廷以，〈民國26年2月〉，《中華民國史事日誌》，<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五)中國的大一統：抗戰前中共即與國民黨談判，並取得抗日共識，當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發表後，中國從沿海至內地，在政治、行政上終於出現前所未有的大一統。⁴²

二、日軍加速進逼

中國統一後，日本認為「中國反中央的軍閥或已失腳、或已歸順，軍隊亦已漸次歸順中央。狀況已逐漸具備國軍的形態，軍隊近時受外國教官指導，改善了訓練與裝備；蔣介石銳意於養成國民航空熱，美國亦與南京政府提攜，於杭州航空學校，訓練空中工作人才，同時將該基地作為擴張空軍之根據地。」⁴³當日本眼見中國建設成就日益顯著，西安事變結果又與其意願大相逕庭，國共合作亦已實現，於是以武力進攻已不可避免，⁴⁴「蘆溝橋事變」因而發生。

「蘆溝橋事變」後，全國抗日決心日熾，蔣委員長認為「蘆溝橋事變」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是日本一貫之陰謀，乃於民國26年7月17日在廬山召集國內各界領袖，發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或稱廬山談話），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政府第一次態度明朗的表明捍衛國家主權和抵抗侵略的嚴正聲明，並要全國國民最後關頭一到，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

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並強調政府之立場為：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⁴⁵

當全國民眾抗日情緒高漲之際，中共表達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使共產黨與紅軍得到合法地位，要求發表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發表邊區政府組織及發表紅軍指揮部組織。⁴⁶政府乃於8月22日收編共軍，任命朱德為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轄3個師，兵額2萬人，歸閻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在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葉挺、項英為新編第四軍正副軍長（由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邊區共軍所編成，轄陳毅等4個支隊），兵額1萬2千人，歸顧祝同指揮。⁴⁷當時政府強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為其徹底的實

42 楊德鈞，《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頁62。

43 賀允宜，《中華民國建國史綱》，頁246。

44 楊德鈞，《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頁62。

45 「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民國26年7月17日），收錄於《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頁584-585。

46 中共另要求政府立即實行發給紅軍平等待遇之經費及補充器物；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之特長；為適應游擊戰原則，須依情況出兵並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韓城渡河前進）；及第一批出動紅軍使用區域，在平漢線以西，平綏線以南地區，並交閻百川節制，詳請參閱人民網，《共產黨新聞》，〈中央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1937年8月18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113.html>

47 有關兵額部分在郭廷以先生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所記述八路軍為4萬5,000人，請參閱郭廷以，《中華

現而奮鬥；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⁴⁸

參、抗戰時期國軍作為

抗戰期間，國軍以正面抗戰為主；共軍則以敵後游擊戰為主，而活躍於鄉村，深入群眾，建立政權。當時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對抗戰自然是責無旁貸，故一切均著眼於抗戰，舉凡抗戰所需的政治、經濟、軍事、兵役、外交、文化、教育…等皆優先處理，故對中共的恣意擴張亦無暇處理。抗戰期間對國民政府而言，先要打破「弱國無外交」的困境，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支持，以舒緩窘困的財政，讓武器得以源源流入；其次是要喚起全國民眾的抗敵意志和愛國情操，作為持久抗日之基石；再次者為防範中共發展，使全國能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發揮統合戰力，驅逐敵寇，恢復國脈民命和國家主權。國軍在抗戰期間的主要作為如后：

一、領導對日抗戰

國軍自蘆溝橋事變起即獨自承擔對日抗

戰的主力工作，當時 蔣公在中日國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毅然宣布最後關頭已至，國軍必須不惜犧牲，抗戰到底。至民國26年12月，日軍攻佔南京之後，以為中華民國會因此屈服，即委由德國大使陶德曼，試探停戰和談；國民政府則堅持必須回復到七七事變前的態勢，絕不接受城下之盟。⁴⁹

八年抗戰期間，國軍歷經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貴柳會戰與湘西會戰等諸多會戰，皆無役不與。據國防部統計與日軍激戰，計有會戰22次、大型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3萬8,931次，傷亡官兵更高達321萬1,481人，更有211位將領捐軀（包括上將8名、中將45名、少將158名）；⁵⁰空軍部分共有6,164位飛行員血灑長空，擊落日機2,668架；海軍則是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掛。⁵¹以日前上演的電影「常德保衛戰」為例，8千國軍官兵阻擊10萬日軍，硬挺15天，余程萬師長發出的最後一通電報，「彈盡，援絕，人已無，城已破……，誓死為止，以報國恩，並祝勝利。」⁵²余師長最後率2百餘人突圍，只餘83人生還。國軍這麼慘烈的傷亡，用生命捍衛國家生存，民族血脈，這些歷史都不應遺忘，更不應擅改否定。

民國史事日誌》，〈1937年09月06日〉<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本文所採用之兵額數為蔣中正所述，請參閱《蘇俄在中國》，頁77；人民網，《共產黨新聞》，〈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1937年8月25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094.html>

48 人民網，〈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周恩來選集（上）》，<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7619/7646/2540675.html>

49 章伯平，〈北京應正視中華民國領導抗戰史實〉，《青年日報》，民國99年9月10日，版7。

50 同註49。

51 中國時報社論，〈正確看待抗戰史，兩岸互信第一課〉，《中國時報》，99年9月12日，版11。

52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2年7月），頁410。

國軍如此英勇抗敵，就連中共領導者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的紀念專文都曾指出：「…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戰，特別是抗戰初期的淞滬、沂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沉重打擊。」⁵³及至抗戰勝利，日軍降書的落款：「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明確指定日本陸海空軍及補給部隊將領率所有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從上述分析，國軍領導抗日的史實，殆無疑義。

二、凝聚民心士氣

國民政府深知抗戰若無全民支持將無法贏得最後勝利，為有效團結全國民眾，民國27年3月國民黨舉行臨時全代會，蔣委員長對黨派問題考慮至深，先行與各黨派領袖研商，擬師國父孫中山組同盟會之義，以統一全國各界意志，集中全國之力量；此議眾皆樂成，唯共產黨堅持反對，然為國家民族久遠計，乃策定〈抗戰建國綱領〉，明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之主張，著重以建國力量支持抗戰，以抗戰精神持續建國；⁵⁴其後，為廣納民意，於7月成立包括中共、青年黨、

民社黨、其他無黨派領袖的「國民參政會」，聽取政府施政報告、詢問、建議施政方向，以團結民心，推動抗戰；另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統一全國青年意志，集中其能力，同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奮鬥，讓青年學生充實國民革命力量，共同擔當抗戰建國大業。⁵⁵

抗戰初期日本委請德國試圖與我議和之舉經中共宣傳後，造成部分國人對國民政府抗日決心產生質疑，國民政府乃分別於民國26年12月17日及民國27年10月31日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和〈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並於民國28年11月8日發表〈中國抗戰與國際情勢〉，廓清國人鬆懈、幻想、苟安等錯誤心理，重振國人鬥志，另指出國際情勢將轉為對我國有利，更增國人信心，⁵⁶全國文化界領袖乃發表〈我們只有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⁵⁷讓曾是「一盤散沙」的民心再度凝聚，共同為抗戰奮鬥。

三、爭取國際支持

抗戰初期我國雖獨力抗戰，但美、英、蘇、法皆不願日本獨霸東亞，而且日本侵華

53 引自《中國時報》，99年9月12日，版11。

54 〈總裁蔣中正先生〉，《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http://www.kmt.org.tw/AboutUs/Aboutus-5.html>。「抗戰建國綱領」的通過中共也表示肯定，中共領袖人物之一的任弼時甚至表示：「這個綱領的頒布，無疑的，是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的同情與擁護。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是最近十年來國民黨最有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這個綱領可以作為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綱領，而願為其完全實現而奮鬥的。」請參閱人民網，《共產黨新聞》，〈為徹底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鬥爭（1940年7月16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9/33207/33213/2557430.html>

55 近代史教學研討會，《中國近代史》，頁457-459。蔣委員長為爭取青年學生的向心，甚至自兼中央大學校長，請參閱陳立夫，《前車之鑑》（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6月），頁307。

56 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五冊—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6月），頁7-8。

57 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11。

行動對列強產生了利益衝突，若日本北進，將與蘇聯直接衝突；若南進，會破壞英、法在華利益，更直接破壞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⁵⁸給予國民政府破除外交困境的機會。

蔣委員長認為中國需要利用美蘇間矛盾及他們彼此對中國之需要與顧慮而策劃，因而有「北疆與俄合作」，「內地與美合作」之規劃，⁵⁹但抗戰初期，僅蘇俄期望中國牽制日軍以減緩日本對其軍事威脅，於民國26年與我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時也在財政及軍事上援助我國，⁶⁰國際間其他強國對日本侵華一事則反應冷淡，國民政府乃電告駐美大使胡適爭取美國對中國之支援，⁶¹但至「珍珠港事變」前，美援仍有限；⁶²同樣的，英國亦不例外，至民國28年（1939年）3月始在財務上勉予支援，⁶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對中國的財務支援及貸款則已力不從心。

「珍珠港事變」後，中日之戰不僅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中，更牽扯著列強在中國利益的維護。對美國而言，中國具有

高度的戰略價值，中國如果繼續對日作戰，可以牽制、消耗日軍；地理位置靠近日本本土，可以發展和維持一個空軍基地轟炸日本，支援美軍在太平洋上的作戰；中國更是征服日本勝利之門，讓美國無論花任何代價，都要把中國的戰時地位保持，⁶⁴使中國的利益與世界強國相結合。

民國31年（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發表〈反侵略共同宣言〉，並接受〈大西洋憲章〉，決心對軸心國宣戰，絕不單獨對敵媾和；其後美、英為加強同盟國間的團結，於國慶前夕，分別通知政府，聲明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讓中國在國際上與各國擁有平等的地位。此後，世界各國相繼與我國簽訂平等新約，⁶⁵從而鞏固中國的國際地位。

四、防止共軍襲擊

全面抗戰後，中共即指派大量政工深入農村，發揮統戰功能，敵後處處可見諸如「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自己人不打

58 美曾就門戶開放政策對日本提出強硬照會；法國在日軍登陸海南島時向日本表達「法日協定」遭破壞，請參閱賀允宜等著，《中華民國建國史綱》（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國74年8月再版），頁281；《新華日報》（重慶），民國28年1月2日，版3；《新華日報》（重慶），民國28年2月11日，版2。

5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52。

60 賀允宜等著，《中華民國建國史綱》，頁319。

61 政府電告胡適之內容為：1.請美促英勿與日本妥協；2.促美對日採遠距離封鎖；3.維持上海公租界之地位；4.修正中立法，區別侵略國與被侵略國；5.對日禁運軍火及軍用品；6.短期間對華借款；7.勿以飛機、煤油、銅鐵售給日本。請參閱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8年10月1日〉，<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62 「珍珠港事變」前美國對華之支援總計有5次貸款，總計為1億7,000萬美元，其中有5千萬美元用於穩定貨幣。請參閱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四篇—抗戰建國(三)》（臺北：史政編譯館，民國79年1月），頁1154-1155。

63 「珍珠港事變」前英國對華之支援總計有5次貸款，總計為18,359,000英鎊，其中有1千萬英鎊用於穩定貨幣。請參閱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四篇—抗戰建國(三)》，頁1210-1211。

64 陳納德著，陳香梅譯，《我與中國》（臺北：華國出版社，民國41年3月），頁166。

65 近代史教學研討會，《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7月），頁464-465。

自己人」之標語，凡國軍所到之處，共軍就大張旗鼓的歡迎，藉以暴露國軍的行蹤，且不時襲擾國軍，以「蒼蠅戰術」於深夜放槍佯攻，擾亂國軍，⁶⁶造成國共衝突不斷。僅自民國29年（1940年）11月起至民國30年（1941年）10月間，統帥部據各戰區正式報告，總計被共軍擾亂襲擊而發生戰鬥次數，共有395次。⁶⁷

民國26年（1937年）9月，第八路軍進入山西後即自由行動，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擴充實力。而且從太原會戰（民國26年11月）後，中共即開始吞併河北、山西的地方抗日部隊，並要求參加河北省政府，蔣委員長乃於民國27年12月30日召見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嚴令該軍及共黨勿破壞河北省行政系統。⁶⁸但中共一直有發展敵後根據地，擴張部隊、組織民兵，作為另起爐灶之打算，故未自制，仍以一貫手法收併各地團隊及保安隊，襲擊敵後縣政府及專員公署，迨實力膨脹，即公然進擊國軍，⁶⁹致國共衝

突日漸升高，使國軍陷於必須一面抗日一面防止共軍襲擊的窘境。

肆、抗戰時期中共的作為

中共在抗戰前即認定「抗日戰爭展開之日，乃蔣介石開始覆亡之時。」⁷⁰國共合作確立後，政府期望全國各黨派及各界人士，在政府領導下，一致抗日，⁷¹但在中共的戰略意圖裡，國共合作只是辯證法的運用，其目的是透過抗戰，以合法的手段擴張勢力，故積極「加強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的鞏固蘇維埃與紅軍，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以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性；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過程中，絕對不應該削弱蘇維埃紅軍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蘇維埃紅軍在一定綱領上同其他政權及武裝力量所成立的政治軍事協定，但並不取消蘇維埃紅軍組織上與領導上的獨立性。」⁷²以強固其地位。

當時中共即告誡所屬「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不能放棄工農主要成分與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而要繼續保障之。」⁷³當

66 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編印，《丹心一傳承與期許》（龍潭：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民國93年1月），頁196。

67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2年7月），頁448-458。

6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8年12月30日〉，<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6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58-259；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448-458。

70 此乃周恩來對美國記者艾德加·史諾所說的話，收錄在其遺著《方生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請參閱嚴靜文，《周恩來評傳》，頁228。

71 當時中國雖稱統一，但各地仍對中央懷有疑心，如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委員長拍電報約李宗仁及白崇禧赴廬山共商大計，當、白二人前往廬山之時，四川省主席劉湘及雲南省主席龍雲即相繼勸阻，認為中央預備對日抗戰，是否出於誠意，尚在未知之數。詳請參閱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臺北：曉園出版社，民國82年7月一版二刷），頁451。

72 〈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1936年9月17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202.html>

73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1937年2月15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139.html>

紅軍改編為國軍後，更強調「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對於南京的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而且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⁷⁴中共在這種游而不擊、獨立自主的情況下進行發展。分析中共作為如后：

一、擴黨、擴軍、建政、組織群眾

「西安事變」後延安即成為中共發展根據地，中共不僅要求八路軍應有其獨立性，軍政幹部必須了解與掌握黨的政策與策略，在政權及地方黨未建立的地方，軍隊政治機關應負全責建立政權與地方黨，而在建立的過程中必須嚴格實行黨的政策，⁷⁵使共軍所到之處即政府命令無法貫徹之處。民國26年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部隊表示：「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這一

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⁷⁶因此，藉著抗戰以「先斬後奏」、「先奏後斬」、「斬而不奏」和「暫時不斬不奏」等方式在各地進行擴黨、擴軍、建政、組織群眾，至民國34年4月止，中共已從1個邊區政府發展成五個邊區政府、8個行政委員會和3個根據地，⁷⁷遍布華北、華中、華南19省地區，控領人口數達9,550萬；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總數91萬，民兵220萬以上，至日本投降時，八路軍更發展為百萬之眾，⁷⁸中共在這些控領區，已然構成一種與國軍平行而帶競爭性且不受政府指揮的力量。⁷⁹

二、輿論宣傳爭取支持

抗戰期間中共的統戰策略是先爭取中立黨派，在民眾間孤立國民黨；其次是爭取美

74 〈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解釋（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2011.htm>

75 〈對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幾點意見（1940年8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2293.htm>

76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79-80。有關這部分史料，在中共相關資料中均未見諸文字，只有在給恩來等人「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的電報時提及：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關於紅軍作戰的原則（1937年8月1日）〉，請參閱《毛澤東文選第二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2001.htm>

77 5個邊區政府為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晉冀豫邊區、晉察冀邊區、晉魯豫邊區；8個行政委員會為山東行政委員會、蘇北行政委員會、蘇中行政委員會、蘇南行政委員會、淮北行政委員會、淮南行政委員會、皖中行政委員會、豫皖行政委員會；3個基地為海南基地、東江基地、浙東基地。請參閱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頁801-802。

78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1945年4月25日）〉，人民網，《共產黨新聞》，〈領袖人物〉，<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9/34103/34117/2536617.html>

7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58。

國的同情，分化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因此當民國26年8月13日上海「淞滬會戰」爆發後，日本委請德國調停議和，雖為蔣委員長嚴拒，⁸⁰中共即認為蔣委員長不是真正的抗日，而是乘機取利，制日制共，不會同日本拼，是機會主義的，⁸¹於是強化對政府的敵意。中共為宣傳其理念，建立在群眾中的領導地位，運用方式概可區分如次：

(一)對政府機構：首先將國民參政會當成宣傳講臺，使一般國民相信中共是堅決抗日的，並聯合部份參政員，在中共對政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發生衝突時，以中立的姿態，轉嫁責任於政府；⁸²其次，在政府機關「佈冷子」，⁸³適時為中共宣傳，影響政府官員對中共的看法與決策。

(二)對知識分子：以遍布全國各大城市的〈新華日報〉為八路軍發聲（政府所發行之〈中央日報〉，無法在中共的邊區政府控領地區發行），每天大幅報導共軍戰況，對國軍戰況則以華中、華南戰區戰況一語帶過，每月還有共軍戰果累計報導，另誇大報導中

共建立的邊區政府經營狀況，⁸⁴誘導民眾對中共的正面認知；其次，對支持中共者即以「進步分子」、「自由分子」予以讚揚，反之，則以「頑固分子」或「反動分子」加以誣蔑撻伐，經〈新華日報〉有意的揚此抑彼，自分畛域後，一般民眾乃誤以為只有共軍才能夠抗日，才是抗日的功臣，國軍是不堪一擊的部隊。

(三)在農村：派遣大量政工幹部深入農村與農民建立關係，宣傳「土地改革」和「民主」的理念，推翻一般民眾「安分守己」和尊重「正牌」的傳統價值，並將「解放區」與外界隔離，⁸⁵營造中共在農村的影響力。

(四)對美國：中共深知美國的影響力，乃利用美國「迪克西代表團」(Dixie Mission)前往延安訪問機會自我宣傳，留給美國人良好印象；其次是運用與美國外交官戴維思(John P. Davies)、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等人接觸時機，俟機攻擊政府並宣揚理念，致渠等將與中共人員接觸所得片面訊息，以外交機密文件拍發了七十多個攻擊政府，中傷蔣

80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92；近代史教學研討會，《中國近代史》，頁449。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員警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員警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請參閱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http://forum.nifty.com/fchina/lin/g/00/0807.htm>

81 〈八路軍新四軍應取長期鬥爭方針〉(1941年7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2358.htm>

82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79。

83 「佈冷子」乃指中共於政府各部門安置人員，平時不與中共連繫，但在重要時候會發揮作用，請參閱熊向暉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民國80年4月)，頁14。

84 諸如民國28年1月31日〈冀南十個月的抗日政權工作〉、28年2月6日〈日趨鞏固的晉豫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等，詳請參閱該日的《新華日報》(重慶)第4版。

85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362。

委員長；讚揚中共民主，讚譽毛澤東的報告和通訊到華府；⁸⁶尤在民國32年5月21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產國際後，中共乃擺脫「共產」色彩，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的「土地改革者」及「民主黨派」，美國境內同情中共人士更為其宣傳，「宣稱國軍已不打日敵，而集中力量將攻打中共」，並使「美國朝野皆為其宣傳所惑，信以為真矣！」⁸⁷

三、獨立自主不自我限制

中共認為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畫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

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⁸⁸並透過電臺統一共軍行動，⁸⁹完全不受軍事委員會節制。因此當其向蔣委員長建議「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為蔣委員長所接受後，中共即在不明著破裂統一戰線，又不自己束縛自己的情況下，要求各地負責人獨立自主推展工作。⁹⁰

四、蘊釀發動內戰

抗戰不僅讓中共可以光明正大的動員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到一切無組織與有組織的群眾中去爭取千百萬的群眾在自己的周圍，建立公開工作與秘密的聯繫。⁹¹就中共立場而言，抗戰勝利後，中國革命即進入了「全國解放戰爭時期」。⁹²當中共藉抗戰從不足3萬人槍的武裝團體，發展成「一個經驗豐富和集合了121萬黨員的強大共產黨，和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9,550萬人口，91萬軍隊，220萬民兵」時，⁹³即訓令所

86 戴維思(John P. Davies)及謝偉志(John Stewart Service)等人之報告可歸納為：一、攻擊政府腐敗無能，中傷蔣委員長；二、讚揚中共民主作法，讚譽毛澤東；三、要求美國裝備中共部隊，強調中共願意與美國合作；四、要求美國壓迫政府組織「聯合政府」。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頁38-40。

87 蔣委員長民國33年2月26日日記所載，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361。

88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711-712。

89 中共訓令各地共軍應「經常接收延安新華社的廣播，沒有收音機的應不惜代價設立之，各地報紙的通訊社，應有專門同志負責接收與編輯的工作，應同延安新華社直接發生通訊關係，關於電臺廣播內容與廣播辦法等，應受延安新華社之直接領導。」〈中央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4/2568622.html>

90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04-505。

91 〈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1936年9月17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2/2568202.html>

92 戴國輝、葉芸芸合著，《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遠流事業出版公司，民國81年3月初版四刷），頁49。

93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10月），頁939；〈毛澤東關於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1945年4月21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6/2568953.html>

屬從事內戰的準備，⁹⁴並利用日軍將敗時，對日軍發動總攻擊，以奪取各地戰略要域，俾利發動內戰。

中共對打內戰早有準備，故抗戰勝利時，8月17日朱德不僅代表「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對政府提出應有權派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人的投降和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等六項要求，⁹⁵更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名義提出五點聲明，致電要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英國駐華大使薛穆，以及蘇俄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請其轉達美、英、蘇三國政府，尤以要求美國「要站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原則

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對於國民黨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繼續執行，如逢國民政府發動反對中國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此種內戰危險現已極其嚴重），勿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⁹⁶同時毛澤東亦決定乘蘇俄仍佔據東北時搶佔東北，要共軍在「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佔優勢，東北也要佔優勢，……那裏一定有文章可做。」⁹⁷並要求國軍除在北平、天津、青島外，平綏、同蒲、正太、隴海東段、平漢北段、津浦、膠濟、北寧、熱河路、滄石路、白晉路、道清路等12條路，不得運兵和駐軍。東北、華北、蘇北、皖北及邊區，不得委派人員。」⁹⁸以利中共在東

94 〈準備應付必然到來的內戰局面（1945年8月4日）〉，《毛澤東文選第三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3452.htm>

95 朱德六項要求摘要如后為：一、你和你的政府與其統帥部在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我要求你事先和我們商量，取得一致意見；二、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我們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財；三、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派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人的投降和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四、中國解放區及一切抗日力量，應有權力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五、請求你制止內戰：其辦法就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向你的軍隊投降；六、請求你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解放區的軍隊，解放政治犯，實行經濟改革及其他各項民主改革。詳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040-1044。

96 朱德五點要求為：一、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統帥部，在接日偽投降與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廣大人民一切真正抗日人民及武裝力量之處，而又未事先取得我們的同意時，我們將保留自己的發言權；二、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在延安總部指揮之下，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被我軍所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料；並負責實行協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三、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應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國的投降和處理敵俘投降後的工作；四、中國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五、為減少中國的內戰危險，請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站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原則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對於中國國民黨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繼續執行。如逢國民政府發動反對中國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此種內戰危險現已極其嚴重），而勿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請參閱陳鑑波，《中華民國春秋》，頁899-901。

97 〈赴重慶談判前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文選第四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4015.htm>

98 八條鐵路為：平綏、同蒲、正太、隴海東段、平漢北段、津浦、膠濟、北寧，〈同國民黨談判的補充意見（1945年10月29日）〉，請參閱《毛澤東文選第四卷》，<http://www.ccyl.org.cn/theory/mxweb/html/mx04051.htm>

北的軍、政發展。

當中共得知蘇聯軍隊將於民國34年11月25日撤出，並同意國軍在葫蘆島、營口登陸，即指示共軍：「現我軍控制葫蘆島、營口，拒止蔣軍登陸……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佈東北人民自治。在此形勢下，戰爭重心將轉入東北，必有一場惡戰。我方必須增調有力兵團參加作戰。」⁹⁹中共為防範國軍進入東北接收，乃在談判中強調「必須立即制止內戰，必須先解決受降、偽軍、自治三大問題，才能恢復交通，否則即是幫助內戰；在受降問題上必須由解放區擔任受降，其他軍隊撤回原防。」¹⁰⁰由於中共的處處阻撓，於是國軍在美軍的協助下，11月3日終於從秦皇島登陸，同時搶修通往山海關的鐵路，因而與中共山海關守軍發生戰鬥，為國共內戰拉開序幕。

伍、抗戰史實應有省思與作為

剿匪未竟全功，抗戰即已爆發，西安事變則為當時內外形勢驟變之關鍵，日軍見事變中全國民眾擁護蔣委員長為惟一能領導全國抗日之領袖、團結禦侮精神充分展現，遂加速對中國的侵略，中共也藉抗戰發展坐大，國民政府在有美援情形下仍為中共所敗，平實而論，其肇因不僅中共的擴張奏功，兼有國民政府的疏失，深值我等省思，

以免重蹈覆轍。

一、省思

抗戰期間，究竟政府有何疏失，讓國人有支持中共的合理藉口，讓中共從不足三萬人槍的武裝團體，成為竊據大陸、領政中國的政黨，省思如后。

(一)疏離基層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專注於民族主義，對於站在共同抗日立場者，皆不究既往，來者不拒，無從兼顧民生；中共則以民生為首務，把抗日當作一種機會，而不以之為一種事業；¹⁰¹國軍在作戰地區則以作戰為先，接近基層民眾，乃「次要作業」；但中共軍隊及幹部活躍於農村，深入群眾，所到之處即將地方組織翻轉改造，建立屬於中共的政權組織；政府仍以「兵隨將轉」之思維，僅經營高層，疏於對基層幹部的關照，讓中共有機會滲透基層，進行理念宣揚。尤以蔣委員長之性情，每有計畫，非俟其成熟，不願告人，而且認為服從命令為軍人唯一之天職，故遇他人向其陳述意見，或有不容異議之見，斥責之嚴厲，對部下為尤甚，¹⁰²造成抗戰期間即使委員長干預機微，積參謀之文牘於統帥几案時，¹⁰³無人敢多言，致下情無法迅速上達，高層與基層脫節，其影響自然在戰後發酵。

(二)宣傳不力

99 〈增兵東北之部署（1945年11月4日）〉，《毛澤東文選第四卷》，<http://www.ccy1.org.cn/theory/mxweb/html/mx04063.htm>

100 〈先解決受降、偽軍、自治三大問題才能恢復交通（1945年11月5日）〉，《毛澤東文選第四卷》，<http://www.ccy1.org.cn/theory/mxweb/html/mx04066.htm>

101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17。

102 蔣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http://www.mfbmclct.edu.hk/reading/%A6%E8%A6w%A8%C6%C5%DC%A6^%BE%D0%BF%FD.htm>

103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89。

中共為鞏固既有勢力，乃宣傳「國民黨政策是兩面性的，不僅要從外面來擊破它，還乘隙打入國民黨各種宣傳堡壘裡面去瓦解它，同時使用合法戰與非法戰，動員外圍軍和中間力量，並利用外國宣傳機關，靈活地、正確地執行宣傳戰，以建立、擴大和鞏固外圍力量與中間力量，」¹⁰⁴使國民政府在輿論處理上只能採取守勢。互抗戰期間，中共運用媒體塑造輿論、特別以政工深入基層、拉攏中間分子等方式，對政府機構、知識分子、農民及國際人士等，進行打擊政府，讚揚中共；誣蔑國軍，稱頌八路軍的宣傳，使高層與基層間；國軍與百姓間；城市與農村間；國內與國際間，對國民政府的認知產生嚴重落差，無形中塑造中共的可期待性。

(三)向心不足

抗戰期間我國武器裝備不如人，人力損失極大，為補充作戰兵員損耗之所需，乃將〈兵役法〉的「徵募並行」制度改為「完全徵兵制」，並頒行〈兵役調查須知〉和〈國民兵組織管理教育實施大綱〉，自民國26年至民國34年止，共徵募1,400餘萬人。¹⁰⁵但國民政府對於兵員的補充只授權地方政府負責，對於兵員的來源則未能有效掌握，不

僅質量不足所需，¹⁰⁶而且弊端叢生，在地方上諸如捉壯丁、躲壯丁、買壯丁、賣壯丁等情事屢見不鮮，部隊接兵官怕壯丁逃走而將壯丁視為罪囚；部隊缺員到處拉伕，不僅讓國人對國民政府心生不滿，也讓新兵對部隊向心不足而逃亡情事不斷。¹⁰⁷

(四)防共不嚴

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後，政府即視中共為抗日夥伴，為一合法政黨，讓防共任務隱晦難張，處處被動；其次，國軍認為共軍經陝北數年圍困後，實力已不足為患，所以當蔣委員長告誡政府人員：「共產黨所謂聯合抗日，其實即為謀奪政權，¹⁰⁸共產黨的宣傳，我們應特別留心。」¹⁰⁹但政府官員及國軍官兵皆認為當前的敵人是日軍，共軍是友軍，故對中共的發展意圖疏於防範，以致當中共人員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高級職務時（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即乘機擴大，使政府在責任上領導抗戰，但實際上則陷於中共與日軍的內外夾擊中。

(五)戰後失策

抗戰勝利後，民生疾苦已亟需復原，休養生息，故在處理程序上操之過急因而失策。首先在處理游擊隊及軍隊復原工作時未能體會官兵心態，致使許多官兵未獲應有之

104 〈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宣傳戰的指示〉，《共產黨新聞》，1941年5月7日，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6/34138/34254/2568638.html>

105 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五冊—總檢討》，頁70-76。

106 國防部史編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五冊—總檢討》，頁73。

107 蔣委員長於西安事會議曾述及接送新兵情形時說：「接兵官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任意丟棄不顧，為要防新兵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243。另王拊在其自傳中亦有談及，請參閱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民國84年8月），頁62-63。

108 《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8，頁57。

109 委員長「出席最高國防會議致詞」（民國26年11月5日），收錄於《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頁652。

禮遇，肇致部分官兵抱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的心態，讓中共無端的接收許多來自國軍的部隊，兵力瞬間擴大；其次，在處理敵佔領區的財政金融事務時，為減少國家財政的負擔又大失策，讓敵佔領區的民眾無論富有與否，全在瞬間都成了「無產階級」，¹¹⁰讓敵佔領區百姓不僅沒有抗戰勝利後的興奮，反因政策的失誤，無端造成民怨，為中共的叛亂增添助力。

二、認知與作為

中共利用抗戰創機造勢，最後憑藉著「小米加步槍」席捲中國大陸，觀其建政歷程，與抗戰勝利不無異曲同工之妙。從抗戰時期中共的作為來看，我們要以下的認知與作為：

(一)揭露真相—中共本質之了解

中共一再宣稱抗戰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贏得的偉大勝利，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抗擊侵華日軍64%、偽軍95%，¹¹¹似乎抗戰是中共獨力完成。但實際上，共軍參與之戰役甚少（應該說只有平型關會戰），部隊大多從事游擊，如何領導全民贏得最後勝利？

雖說戰勝者擁有較大歷史的解釋權，

對中共而言，那只是對日抗戰勝利後的內戰的部分。八年抗戰是由國民政府所領導的事實是不容質疑的，抗戰歷史必須還原，讓中華子民世代都了解這段苦難史，將中共的欺騙行徑揭露於世，讓歷史還國民政府一個公道。昔日的中共會利用抗戰來進行擴張、叛亂；今日也會利用兩岸交流頻繁、國人心防鬆懈之際，對我進行滲透，因為中共迄未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不論其「一個中國三段論」如何改變，¹¹²消滅「中華民國」的野心絕不會改變。

(二)不屈不撓—抗戰精神之發揚

剖析抗戰獲勝原因，不是靠武器裝備，端賴中華兒女「無形戰力」的發揮，人人皆知「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的真諦，人人展現大無畏的「抗戰精神」，以自我犧牲換取國家永續生存發展而戰。

現代戰爭是高科技戰爭，然操作武器的是人，人有人性，要發揮高科技作戰的最大功能，最重要的是在於每一官兵要有強烈的責任感、榮譽心與忠貞志節，進而激發出旺盛的企圖心。¹¹³是以未來戰爭的決勝因素將是軍隊的人力素質，因此我們有必要以敵為師，仿效鄧小平的「四個捨得」，¹¹⁴依據臺、澎防衛作戰所需，培養高素質的軍中人

110 陳立夫，《前車之鑑》，頁336-338。

111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1945年4月25日）〉，《共產黨新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39/34103/34117/2536617.html>

112 中共六〇年代的「老三段論」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九〇年代錢其琛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現今改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儘管兩岸尚未統一，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並未改變。」請參閱〈從錢其琛的「三段論」到賈慶林的「四段論」〉，《聯合報》，民國94年2月2日，版A2。

113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從「黃埔精神」談民主憲政體制下軍人應有的價值與信念〉，民國93年10月，頁1。

114 鄧小平於1983年5月要求共軍辦好軍隊院校，乃要求要：捨得拿最好的幹部到院校工作；捨得讓優秀的幹

力，將「抗戰精神」灌注其中，發展出高素質的軍事學校教育，及適合我國特性的軍事戰略和戰術、戰法，俾為臺灣的安全與安定奠定穩固的基石。

(三)同心協力—全民國防之強化

兩岸情勢瞬息萬變，面對中共的「三戰」（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全民國防」益顯重要；《國防法》第三條揭示：「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況且「現代的戰爭與現代的國防，已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是牽動整個國力、軍力、民力與精神力的綜合行為；而國家的安全威脅，亦不僅限於外部的軍事威脅，且應包括來自內部的天然與人為威脅，故建立全面的綜合性安全觀念是國家邁入21世紀後全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概念與共識。」¹¹⁵因此，我們必須激發國人的愛國心和警覺心，居安思危，對任何可能的潛在威脅，抱持最高的警覺與心防，做為國軍的最大後盾；真正做到軍民合一，讓我們的國軍，時時刻刻保持最佳的戰備與最高昂的士氣，隨時可以迎接任何挑戰，¹¹⁶讓國家安全，成為全民的共同信念。

(四)不惑不懼—心理防線之鞏固

中共自2002年6月決定「經濟發展高

於祖國統一」的政策後，中共對臺灣能作的便只有心理戰，¹¹⁷中共認為當戰爭爆發後，戰場外進行的威懾戰爭，將佔據暴力型戰爭外的所有時空，所以中共心理戰乃以戰略性的思考，配合戰術性的行動，以敵方軍事統帥為目標，置其於被動地位；以敵方軍隊為目標，挫傷其士氣；以敵方民眾為目標，削弱其對戰爭的支持；以高技術武器為心理戰武器，實施強制性心理攻擊。¹¹⁸因此，中共在軍事領域外，企圖以非武力的「政、戰、經濟、外交」一體的「運動包圍戰」，¹¹⁹達到兵不血刃攻併臺灣的目標。我們必須從心戰、心防教育著手，堅定國家信念的核心價值，凝聚國人的向心，使國人皆能面對中共當前「盤馬彎弓箭不發」的「威懾心理戰」而不懼。

(五)明敵制敵—戰略文化之研究

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社群成員為達成政治目標與解決政治問題時，對國家安全、戰爭觀及軍事武力之運用，共有的認知與價值觀所產生的習慣偏好與制約性的反應模式。¹²⁰也是該社會所偏好企圖傳承的一種經過融合，為大家所接受的表徵。¹²¹因此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共的戰略思維，方能

部、戰士進院校學習；捨得把先進的技術裝備發給院校；該花的錢捨得花。詳請參閱《鄧小平思想寶庫下冊》（上海：紅旗出版社，1993年3月），頁2230。

115 《九十三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4年12月），頁183。

116 陳總統水扁，〈堅強國防是國家安全最大保障〉，《奮鬥月刊》，第613期，民國93年11月，頁6-7。

117 林中斌，〈點穴戰是衝突焦點〉，請參閱<http://www.chinabiz.org.tw/maz/InvCina/199909-067/199909-025.html>

118 許如亨，〈解構另類戰爭—心理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下）〉（臺北：翔威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8年12月），頁591。

119 林中斌主編，〈廟算臺海〉（臺北：學生書局，民國91年12月），頁X-XI。

120 劉順銘，〈中共戰略文化研究〉，第九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民國90年6月29日，頁60。

121 Colin S. Gray, *Explorations in Strateg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84.

對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戰略發展趨勢深入剖析。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有共同的文化來源，對於研究中共戰略文化，我們有先天的優勢。因此，為了臺灣的穩定與安全及衝突預防，必須深入研究中共戰略文化，方能掌握中共的思維理則和進退依據，不致為形式邏輯所羈絆而誤判形勢。

陸、結 語

古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66年前，由於中國內部黨爭不止，導致政治紛亂，內戰不息，讓日本得以欺凌、侵略中國，經全民團結一致抗日，始驅除敵寇，贏得最後勝利。但諷刺的是，領導抗戰贏得勝利者卻退據臺灣一隅。或許有太多的巧合，讓中共得以坐大，畢竟中共的辯證本質的確不能等閒視之，其對領土主權的捍衛也絕非「一個中國三段論」所能遮掩其真意，我們勿為其外表所蒙蔽，雖說中共目前以經濟發展為主，但其「政治為先」的戰略文化特質仍未改變。《司馬法，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們不可因為當前的和平景象，而忘了兩岸情勢仍然嚴峻。

誠然，在抗戰的過程中，共軍扮演著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其所強調的「敵後戰場」部分，其在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努力，我們給予肯定。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取代「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的歷史定論。因此，我國人應了解歷史、忠於歷史，進而傳承歷史，一起緬懷及捍衛先賢、先烈的抗日史實，讓這些光榮事蹟永傳後世。

最後，歷史告訴我們，團結者勝，人心離散者敗，《孟子 告子篇》曾云：「入則

無法家佛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清朝紀曉嵐所著《閱微草堂集》亦曰：「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辱至。」臺灣只是一個蕞爾小島，中共仍在一旁虎視眈眈，實不容再分你我或藍綠，撕裂族群而自我內耗。我們必須繼志承烈，深切體認並發揚抗戰精神，落實戰訓本務，激揚全民愛國心，團結一致，堅定「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的信念，以全民國防的理念守護臺灣這片土地。

收件：99年09月14日

修正：100年06月09日

接受：100年06月15日

作者簡介

劉順銘，政校預官73年班、政校研究班83年班、管院決策所碩士；現任職於國防大學共教中心上校教官。

莊國平，政校政治系82年班、國防大學空院94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於國防大學共教中心中校教官。